

《苦难的年代》之历史叙事初探： 中国朝鲜族形成史的还原、误读与重建

李海英(中国海洋大学)

绪言

李根全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年代》是朝鲜族文坛的第一篇移民叙事作品。全书分上下两卷，分别发表于1982年、1984年，讲述的是自19世纪初至解放前后约半个世纪的朝鲜族移民史与民族形成过程。作品叙事宏大，历史感凝重，却未受到充分重视。作品问世之初，曾受到一些批评家、作家的关注，^①之后却一直被忽略、批判。80年代末，批评与研究者讥讽它“与我们所学的历史教科书有某种相似性”，^②程式性、极端的阶级对立视角等作品的局限性被一一指出，受到辛辣批判。90年代以后刊行的各种中国朝鲜族文学史中^③，虽然承认它是“朝鲜族的首次移民叙事”，但也只是一笔带过，未给予充分关注。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与改革开放以后日益增强的脱理念化、多元化文学创作观息息相关。90年代初朝鲜族作家崔红一发表了与《苦难的年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泪洒图们江》。该作品是在明确的脱程式化创作理念下完成的，作者明确宣称“窃以为，生活之苦楚，为了表其凄惨哀绝之貌，须从程式化中脱离出来，表现人之本体，从多重角度刻画人。”^④这部作品标志着脱程式化、脱理念化移民叙事的诞生，一经发表，备受瞩目，好评连连。与此同时，《苦难的年代》则在与它的对照中，愈被否定，几乎淡出学界视野。

诚然，“教科书般的程式化”是《苦难的年代》的文学局限性。作品在叙述朝鲜族移民史时，完全从阶级对立视角出发，以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为中心，而对朝鲜人与东北原住民及东北境内其他各民族间的尖锐矛盾、朝鲜人即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的尴尬处境，以及朝鲜人移住民的真实生活等等，全部略去不书，从而造成了叙事的单一性、片面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苦难的年代》详实地记述了1920年代中后期到1930年代末东北朝鲜人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抗日的历史。根据相关史料记载，1920年代初期东北朝鲜人民族主义者的抗日斗争与1920中后期至1930年代朝鲜人共产主义者的抗日斗争都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回忆、还原这段历史的移民叙事作品只有《苦难的年代》。其他描写朝鲜人移民史的作品均未涉及该段历史。^⑤从这个角度来看，《苦难的年代》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那么，我们有必要深思为什么李根全选择以这种方式叙述朝鲜人移民史？

^① 徐日权. 李根全与他的文学 [J]. 阿里郎, 1982(8): 288-308 页。

金东勋. 关于长篇历史小说《困难的年代》 [J]. 阿里郎, 1983(11): 359-375 页。

赵成日. 长篇历史小说《苦难的年代》(上)的思想艺术特色 [J]. 延边文艺, 1983: 63-68 页。

^② 金东活. 对《苦难的年代》的本体论思考 [J]. 文学与艺术, 1988: 31 页。

^③ 迄今刊行的主要朝鲜族文学史著作如下：《中国朝鲜族文学史》（赵成日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0）、《改革开放与中国朝鲜族小说文学》（吴相顺，月人，2001）、《中国朝鲜族文学史》（吴相顺主编，民族出版社，2007）、《解放后朝鲜族文学研究》（李光一，景仁文化社，2003）、《中国朝鲜族的昨天和今天》（郑德准，绿色思想，2006）、《朝鲜族文学史》（李光一、金虎雄、权哲，延边大学出版社，2013）。

^④ 崔红一. 向着历史小说的新地平 [J]. 文学与艺术, 1995(4): 6 页。

^⑤ 《泪洒图们江》、《北间岛》等最具代表性的朝鲜人移民叙事作品均为描写东北共产主义者的抗日斗争。以脱理念主义备受好评的《泪洒图们江》，叙事时间截止于1900年代初，日本侵略等均不见诸叙事。安寿吉的《北间岛》，对1920年代东北地区民族主义者的抗日武装斗争浓墨特书，而对1930年代社会主义者的抗日武装斗争则只有只字片言。

目前对《苦难的年代》的批评和研究主要聚焦在“忘却”，即关注他为何“忘却”民族主义者的抗日武装斗争，为何“忘却”东北朝鲜人的真实生活，认为这种有意识的“忘却”导致了作品叙事的单一性，甚至认为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如果说忘却是对无意义的删除，记忆便是对有意义的选择。^①《苦难的年代》“忘却”了很多，却详细地“记忆”着其他人都选择“忘却”的东北朝鲜人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斗争。这是为什么呢？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该作品与我国朝鲜族发展史，绝不可忽略这个问题。基于此，本文拟重点关注《苦难的年代》所“记忆”的内容，考察其“记忆”的历史背景与目的、方式。

解放到文革：朝鲜族的国家认同危机与李根全的历史认识

李根全自称《苦难的年代》的构思始于1953年。当时在舒兰的一所小学，一位小学老师向身为记者的李根全问道：“我们朝鲜族成为少数民族的历史有多久了？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有什么故事？”然而，李根全自己也不知道，只好沉默以对。正是这个关于朝鲜族历史的提问使他萌发了创作《苦难的年代》的念头。而且，从这则故事也不难看出当时朝鲜族的祖国观与国家认同尚不清晰。

事实上，建国初期到1960年代，朝鲜族虽然获得了中国公民权，但仍然十分重视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以下简称朝鲜）的血缘之情。当时，在朝鲜族干部、教师、学生等一些知识分子阶层之间曾十分流行“多祖国论”。这种理论认为朝鲜是朝鲜族的“民族祖国”、“第一祖国”、“感情祖国”，中国是“法律祖国”、“第二祖国”、“现实祖国”，苏联是“无产阶级祖国”、“第三祖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区第一任主席朱德海一开始便认识到了这种论调的谬误。他认为中国朝鲜族虽然与朝鲜境内的朝鲜人同属一个民族，但是所持的公民权不同，所以任何情况下都是中国公民。然而他的批判、告诫也未能阻止“多祖国论”的蔓延。而且，在全国性反右派斗争的影响下，延边地区也出现起了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这更使得朝鲜族的祖国观与国家认同成为了十分严肃的政治问题。再加上当时朝鲜缺乏劳动力，重新回到朝鲜的“逆移民”现象频繁发生。

朝鲜族的“朝鲜逆移民”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根据中国与朝鲜的官方协议进行的集体移民，另一种是民间非法越境。其中，非法越境的情况占了绝大多数。中国朝鲜族的第一次集体移住北朝鲜发生在1959年3月末。关于当时的情况，《内部参考》2724期中有如是记载：“一群中国国籍的朝鲜族即将前去参加朝鲜建设。吉林省的7000户中国朝鲜族为了（国家）建设即将赶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笔者：吉林省1959年的规定额度为7000户）……但是大多数县里，申请去朝鲜的户数大大超过规定额度，已然成为一个大问题（下划线：笔者）。例如，海龙、磐石、舒兰等朝鲜族四县，超过了规定额度的2.4倍，多达5118户。”^②由此可见当时的“逆移民”规模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他们的移民动机也是各不相同。

申请者中只有符合条件、受过教育的人明白前去的意义。除去他们，大部分人有很多动机。

在人民公社中工作很辛苦。没有自由。朝鲜是祖国（下划线：引用者）。亲人在朝鲜，希望团聚。不想做农民，想去北朝鲜当工人。去朝鲜娶妻。借机逃债。收回在人民公社的投资，投机

^① 金钟郁. 历史的忘却与民族的想象——安寿吉的《北间岛》研究[J]. 国际语文, 2004(30): 278-279页。

^② 一群中国国籍的朝鲜族即将前往朝鲜参加建设 [N]. 内部参考, 1959年3月8日(13页); 朴宗澈, 「中国的民族整风运动与朝鲜族的北朝鲜移民」, 『韩中社会科学研究』第13卷第3号(总卷36호), 2015, 166-167页, 再引用。

谋暴利。认为去朝鲜会被重用。某些右派分子和有问题的干部想改变国籍，清算过去（下划线：笔者）。

一些农民在得到批准之前，就不再工作，变卖家具，吃喝玩乐。还有很多农民在乡里或县里请愿。^①

从以上记录可知当时朝鲜族“逆移民”的原因十分多样。其中固然不乏投机心理，除此之外，“民族祖国论”、反右派政治斗争、尚不适应新中国的政治及生活工作环境等均为主要原因。这也再次表明当时部分朝鲜族的国家观比较混乱，尚处于国家认同构建的初期阶段。

国家认同问题是朝鲜族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引起了部分朝鲜族知识分子的注意。李根全早在 1962 年便创作了回应朝鲜族国家认同问题的小说《老虎崖》。该小说的主要内容如下：抗战胜利后，东北朝鲜人接受共产主义理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到与国民党的决战，从而成为堂堂正正的新中国主人。可以说，这是一部旨在培养朝鲜族的正确国家观，强化朝鲜族国家认同的作品。^② 然而即便是这篇作品也在文革期间被定为“毒草”，李根全作因此被下放到 5.7 干部学校。这段亲身经历使李根全更迫切地意识到确立朝鲜族历史正统性，进一步巩固朝鲜族作为少数民族一员地位的必要性。《苦难的年代（下）》出版后不久，1984 年 11 月，他在一篇名为“用历史将民族之魂”的访谈中讲述了自己重视历史题材的原因：“始于想让青年们知道今天的幸福如何得来并更加珍惜的意图，更希望通过真正了解我们民族过去的历史明悟我们民族的应立之所。人们一般都说朝鲜族是在朝鲜活不下去，为了讨饭吃来到中国的，但这是片面的。我们民族自古脚踏这片土地，先与大自然斗争，与封建阶级和官僚斗争，而且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各族人民并肩作战，与各民族一同书写了中国近代史。”^③ 从这段意味深长的话中不难窥测李根全的历史认识与创作意图。事实上，《苦难的年代》较之《泪洒图们江》明显更程式化、理念化的原因之一也在于两人在历史认识上的差异。李根全于 1929 年出生在朝鲜慈江道，1937 年随父亲移住中国，是朝鲜族第一代革命家，与第二或者说第三代朝鲜族作家崔红一在生活背景、人生历程等方面都十分不同，他所承受的历史重压与他的使命感也远远超过崔红一。总而言之，《苦难的年代》的创作与建国初期朝鲜族的国家认同危机息息相关，作品中对过去历史的还原与解读中隐藏着他对朝鲜族现在与未来的思考和展望。

19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朝鲜人共产主义者抗日斗争

《苦难的年代》由上、下两卷构成。上卷从朴千秀、吴永吉、崔英世三个家庭冒着生命危险渡江的场面写起，描述了他们在东北延边不同地方以不同方式扎根生活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阶级矛盾；下卷讲述了二三十年代延边地区朝鲜人的革命斗争史。下卷以朴千秀家族的第二代朴胤敏寻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叙事主线，详细描述了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前后的革命斗争情况与变化。在接受党的领导之前，朝鲜人的斗争是自发性的，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没有任何经验，甚至还有部分朝鲜人民族主义者和抗日义兵团打着抗日的

^① 同上。

^② 此处可参看李海英. 中国朝鲜族的选择与朝鲜人干部的作用[J]. 韩国现代文学研究, 2015(45): 305-306 页。

^③ 李根全. 通过历史将民族之魂[J]. 文学和艺术, 1985: 71 页。

名义劫掠百姓财物。^①因此以朴胤敏为首的朝鲜人革命家迫切希望找到中国共产党，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正确斗争。果然，在他们接受了党的领导之后，形势立即转好。小说详细地叙述了东北朝鲜人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斗争，对 1920 年代后半至 1930 年代末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与日帝铁蹄下的东北沦陷区历史现实进行了详细生动的文学性还原。

天一亮，大家开始沸沸扬扬地湧进学校运动场。运动场瞬间人山人海，每个人的表情都是洋溢着欢快。人声鼎沸中，很多人将1913年赶走马翔洙，在吴永吉谷仓放火的暴乱时期与今天对比。当时其实没有周密的准备，不过是愤不能忍，纷纷跟着金范道聚到吴永吉的院子里罢了。所以，结果仅仅是惊吓一场，没能如何让吴永吉尝到锥心之痛。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党领导他们进行了有计划的长期准备（下划线：引用者）。而且，他们还有了春荒斗争的经验。更让人高兴的是昨天上面派来了安景林同志，人们的斗志更加高昂了。^②

1920 年代后半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边农村展开了减租减息斗争，上述引用文描述的便是斗争开幕时的情景。“但是今天不一样了。”这句话简洁而有力地说明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前后革命形势的明显变化，成功地展现出了农民们的高涨热情，凸显了他们对党的信任以及对减租减息运动的信心。接着小说又用大量的篇幅叙述了此次斗争的具体经过。减租减息运动的主要斗争与协商对象地主吴永吉得到消息后迅速出逃，这让农民们士气衰落，斗争队伍陷入混乱，此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安景林站了出来，为观众们鼓劲打气，使大家再次鼓起斗志，团结作战，最终取得胜利。因此可以说，李根全对延边农村地区的减租减息斗争进行了全景式的文学再现。若对比一下《北间岛》的描写，则更觉此点之明晰。安寿吉的《北间岛》也是朝鲜人移民叙事的杰出代表作，其中未讲述减租减息运动，但提到了与之类似的秋收斗争，然而仅有短短一言，且暗含着并不赞同的态度。^③相较之下，更能看出《苦难的年代》在朝鲜人共产主义者革命史叙述上的浓墨重彩和李根全的叙事策略。

小说还用“五月”一整章对发生在 1930 年的“5.30 纪念暴动”进行了详细描写。小说把主人公朴胤敏设定为 5 月 30 日爆炸事件的指挥与主谋，将斗争的目的、准备、计划、执行，直至最终举事成功等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我回报一下情况。我们小组共有十人。已决定5月30日晚上10点，其中六人放风防止外人来仓库，二人放倒日本警察，其他二人背着炸药到这里来。距离这里不超过3里，20分钟足够了。^④

以上是龙井中国共产党地下党负责人朴胤敏与其他地下组织成员核对 5 月 30 日举事计划的场面。他们对行动小组的总人数、放风的人数、对付日本警察的人数、运送炸药的人数，以及距离爆破地点的距离和所需时间等都进行了精密的计算。同样地，《北间岛》中也提到了这次事件。“啞啞，啞啞。直穿肺腑的爆响中，房屋也随之晃动。‘这是什么？’ 贤道

^① 李海英. 日帝时期间岛移住与文学化的两种式样——安寿吉的《北间岛》与李根全的《苦难的年代》[J]. 韩国学研究, 2009(21): 24 页。

^② 李根全. 苦难的年代（下）[M].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4：382页。

^③ 安寿吉. 北间岛[M]. 首尔：学院出版公司，1997：343-344页。“去年秋天说是秋收暴动，要火烧秋天刚收的稻碓，我在水七沟收的租子也在打场前被烧了……”

^④ 李根全. 苦难的年代（下）[M].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4：404页。

也瞪大了眼睛，万石立即跑了出去。一会后跑进来喊道，‘好像向东拓扔炸药了。’然后又跑出去了。‘孩子，小心。’瞪圆了眼睛的贤道嘱咐儿子小心。‘这是怎么回事？’景修问道。‘应该是共产党。’‘什么？’‘最近两年不知道怎么说睡觉都睡不踏实。’”这便是《北间岛》对此次事件经过的全部描述，简笔带过，语藏不屑，与《苦难的年代》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天，胤敏得知前天晚上的举事按照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首先炸了发电所，把整个龙井变成黑暗王国，然后炸了铁桥和酒厂。而且把万恶之源东拓公司也给烧了。然而有些人趁着黑暗一片在领事馆内也扔了炸弹，造成了那一带的混乱。爆炸事件不仅在龙井，千宝山、老头沟、头道沟、和龙、局子街等地也在同一天接连举事。因此，5.30日晚的暴动震动了整个间岛，让日本帝国主义惊恐颤栗。因为这次事件先后有三十余人被日本鬼子逮捕，但是其中一大半是无辜的群众。其中17名以后被押送到首尔西大门刑务所，惨遭绞杀。这就是历史上相传的‘30名事件’。^①

以上是《苦难的年代》对“5.30 纪念暴动”结果的记述。小说从爆破发电所、铁桥、酒厂、东拓公司到向领事馆内投掷炸弹，一一说明，甚至对龙井以外地区的同时爆炸事件与事件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30 名事件”也做了记述。下面对照一下《北间岛》中的描述：“‘5.30 暴动！’‘共产党在东拓掷弹！’‘农村地主等等被杀-’第二天，龙井刊行的各种日文、朝鲜文报纸上以诸如此类的题目进行了大力报导。‘连市内都？’‘这是大事啊！’街谈巷议，人心惶惶。然而，比起新闻的大报特报和街头巷尾的恐慌气氛，东拓分公司的损失并不大。”^②同样的简略而不屑。

《苦难的年代》还记述了1930年代末的共产党人抗日情形。1939年冬天，因为日本关东军与伪满国军的血腥镇压及长期追踪，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几乎陷入覆灭危机。但他们不气馁不放弃，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主动撤至中-苏边境地区。此时，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国军的治安肃清运动已显见成效，1932年夏天最高曾达30万的匪贼减至几百名，最后的武装抗日斗争力量东北抗日联军也于1939年冬天在追击中退至伪满与朝鲜边境，几乎全军覆没。^③

- ① 从去年开始，日本鬼子在南北满洲投了30万大军进行大扫荡。先在一个地方张网，并慢慢缩紧，待清完吃掉之后，再转移地点。一直以这种方式肃清吞掉该地区，这就是鬼子们寸土不放的连续作战。所以，各个山和谷里都覆满了敌人，每一个‘集体村落’还有看守部落的自卫团，一不小心，就可能陷入被生俘险境。^④
- ② 几天前，在司部的同志来我家传话，说安景林和李振东同志已经牺牲了。他说要是你来到这里，部队已经转移到北满洲了，让你去苏-满边境线上找部队。万一找不到部队，让你去延安找。^⑤

引用文^①真实地记录了 1939 年冬后东北抗日联军陷入覆灭危机时的历史景象：日寇的森严封锁与扫荡下，抗日根据地被破坏，村庄被强制撤离，“集体村落”割断了抗日联军和百姓的关系。小说中用“向着延安”一整章的篇幅描述了外出取粮途中意外脱离部队的朴胤

^① 李根全. 苦难的年代（下）[M].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4：411页。

^② 安寿吉. 北间岛[M]. 首尔：学院出版公司，1997：344 页。

^③ 韩锡政. “满洲国”建国的再解释[M]. 首尔：东亚大学出版社，2009：80页。

^④ 李根全. 苦难的年代（下）[M].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4：661页。

^⑤ 李根全. 苦难的年代（下）[M].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4：667页。

敏与他的侄子桂东避开日军追击，逃到山中，几经流转，重新找到部队的过程。作品通过他逃亡其间目睹的各种场景，形象地再现了在日军和伪满国军的封锁下抗战进入停滞期时的历史场景。引用文②主要讲述抗日武装的应对策略和后续安排。指导者接连牺牲，东北抗日联军全体陷入覆灭危机，主力部队决定向中-苏边境转移，转移过程中因故落伍的战士如果找不到部队，可以去延安。

综上所述，对 1920 年代后半期到 1930 年代末朝鲜人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武装斗争和地下斗争，以及期间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还原与文学再现是《苦难的年代》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小说用大量篇幅描述了 1920 年代后半期的减租减息斗争、1930 年 5 月 30 日晚的“5.30 暴动”、日军的“间岛征讨”、海兰江惨案以及日军为了切断抗日联军与群众关系在东北推行的“集体村落”政策和 1939 年末东北抗日联军向中-苏边境线撤退等历史事件。这些均是当时东北朝鲜人共产主义者和贫苦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抗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政府的英勇斗争，代表着朝鲜族在东北抗日斗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李根全欲以此告诉世人，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朝鲜人浴血奋战，功勋彪炳，为了共产主义大义努力克服狭隘民族主义，他们是以巨大的自我牺牲获得了现在的幸福生活和中国人民资格。

朝鲜族的历史正统性确认：延安归来

《苦难的年代》的最后一章《战争还没结束》主要讲述解放后延边朝鲜人的抉择和命运，它是这样开始的：“1945 年 10 月中旬朴胤敏和王株从延安回到了解放后的延边。胤敏被任命为地委书记，王株成了专员。”^①也就是说，延边的第一领导人地委书记朴胤敏与相当于第二领导人的专员王株都是从延安回来的。众所周知，延安当时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中枢、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所以，朴胤敏二人的延安归来直接将延边朝鲜人，即朝鲜族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史联系起来，从而确立了朝鲜族的历史正统性。

②

可是东北抗日联军麾下的朴胤敏、王株怎么会从延安回延边？当然，小说前面部分已经预先埋下了伏笔：在中-苏边境地带脱离了队伍的朴胤敏和王株未能重新找到部队，遂赶赴延安。然而事实上，1939 年末被称为“最后的抗日力量”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为避开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国军的追击进入苏联境内后，直至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夜才跟随出兵东北的苏军重返东北。从陕西延安进军东北的部队实为朝鲜义勇军。^③ 朴胤敏、王株的延安归来其实是为了将延边与延安连接起来而有意设置的文学情节。

那么，解放后延边的真实政治情况如何呢？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宣布参战，9 日分两路进军珲春和绥芬河，10 日占领了延边东面的珲春线所在地，20 日占领和龙，至此，延边全境被苏联红军解放。苏联指命原伪满洲国间岛省省长尹泰东组织临

^① 李根全. 苦难的年代（下）[M].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4：680 页。

^② 李海英. 日帝时期间岛移住与文学化的两种式样——安寿吉的《北间岛》与李根全的《苦难的年代》[J]. 韩国学研究，2009（21）：29 页。

^③ 《朱德海的一生》执笔组. 朱德海的一生[M].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8：127-128 页。朝鲜义勇军到达沈阳后，在西塔附近的运动场召开了军人大会，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当时武亭司令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将少数朝鲜义勇军指导干部派遣到朝鲜，其他大部分指挥员和战斗人员留在东北。武亭司令员呼吁部队全体人员立即深入东北各地，广泛发动在满朝鲜人，扩大义勇军，为即将到来的中国与朝鲜解放做好准备。朝鲜义勇军分 3 个支队，分别进入“南满”、“北满”、“东满”，执行扩军任务。

时政府，维持行政运转。国名党也组织成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办事处”、“国名党延吉县党部”，在各地地区扩建了9个区党部。同时期进入延边的共产主义势力主要有三支：当地共产主义者、中共延边地区事业委员会（以下简称88旅团）、三十三人延安干部团。其中，当地共产主义者是抗日联军在的日军追击下退到中-苏边境时失去联系的人，他们组成了民兵队，在苏联入城之前，致力于维护当地治安，之后被随苏军归来的88旅团吸收。88旅团是三十-四十年代进入苏联，驻扎在哈巴罗夫斯克密营的东北抗日联军指挥部。他们在苏军入城之前，接到通知，组成了东北委员会。三十三人延安干部团则是中共中央直接派遣的干部团。中共中央在重组中共满洲省委的同时，建立了东北军，并于1945年11月12日，从延安向延边派遣了三十三名干部。^①这三十三人全部是中国人，即汉族干部。当时并不存在直接从延边派遣来的朝鲜人干部，第一名直接从延安派遣到延边的朝鲜人代表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区首任区长朱德海。

朱德海出生于俄罗斯远东沿海州，早年失怙，随母亲回到父亲的故乡朝鲜会宁，之后又于1920年越过图们江，移居和龙县（现龙井县境内）。1920年代末在朝鲜共产党（ML派）领导下参加革命，1929年开始按照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方针，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统一领导下投身抗日，曾担任密山抗日游击队后方根据地负责人等。1936年6月，受中共勃利县委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求学。一年半的学习结束后，1939年3月踏上回国之路，经新疆、兰州、西安等前往延安。在延安，他先是被编入抗日军政大学干部训练队东北干部训练班，训练班结束后被分派到八路军359旅第718团特务连。之后，又在1942年初进入延安海外研究班进修，1943年左右参与了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建校与管理工

关于朱德海在延安的经历，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他曾被编入抗日军政大学干部训练队东北干部训练班学习。该训练班由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成立，旨在培养熟悉当地情况，日后可派遣到东北工作的干部，学生大多数来自东北或河北、热河一代。由此可知，延安中共在抗战胜利之前便十分重视东北，希望通过训练、派遣东北出身的干部，将延安和东北联系起来，以更好地指导当地的革命斗争。第二，他在延安海外研究班的经历。该研究班是朱德总司令兼任书记的中央海外委员会下设的机构，位于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坪。朱德海极有可能在这里见到了朱德、叶剑英、胡耀邦等中共主要领导人，甚至可能与他们达成了某种共识和默契。这是日后他能与中共紧密联系，统一立场，树立领导威望的重要契机。第三，他在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时的经历。该学校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为朝鲜革命培养后备干部的学校，共有200余名学生，且学生来源多样，包括来自敌后根据地的朝鲜义勇军将兵、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朝鲜人、从苏联来的学生、从日本侵略者和傀儡军中投明的朝鲜青年等等。学校成立之前，朱德海受党中央派遣，作为管理科科长参与了建校工作。学校成立之后，又先后出任学校党委委员、教务委员，兼任总务处处长等职务。由此可知，自这一时期，党中央便对他报以格外的信任。以后朝鲜义勇军进入沈阳后，朱德海还被任命为第三支队政治委员。当时，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握着他的手说：“朱德海同志，北满的工作全交给你了。那里有达数十万的朝鲜同胞。他们现在正等待各位同志前去。”^②这段话明确显示出朱德海在东北朝鲜义勇军中的地位，也暗中指出了他日后在东北的工作性质和方向。

此时，朱德海应该也已明了自己的工作方向和职责。这可以从下面一件小事中窥见端倪。

^① 李振英. 从朝鲜人到朝鲜族[J]. 中苏研究, 2002(95): 95-98页。

^② 《朱德海的一生》执笔组. 朱德海的一生[M]. 延吉: 延边人民出版社, 1988: 128页。

1946年前后，朱德海在哈尔滨会见延安旧识崔采，听说崔采打算前往朝鲜，他立即阻拦，“不要去，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干一场吧！”崔采以已经前往朝鲜的家人为由拒绝之后，他承诺让崔采的家人回来，从而留住了崔采。之后，因为革命需要，金泽明、金延、李根山等支队领导干部先后前往朝鲜，但是朱德海依然留在东北，继续担任领导任务。1948年4月，他接受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政部调遣，被任命为民族事务处处长。这意味着他在建国前夕，迈出了未来成为新中国少数民族事务管理干部的第一步。1948年8月，朱德海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定前往延边。当时东北局负责人对朱德海说：“同志是延边人，应该熟悉那里的情况。延边是拥有光荣传统的老抗日根据地。派遣同志去延边，是希望你带领朝鲜族和其他民族好好建设延边。”^①这段话不仅透露了中共中央派朱德海为延边最高领导人的背景，也说明朱德海十分赞同中共中央在延边问题上的立场和设想。因此他到延边之后的态度和立场可想而知。1948年12月开始召开的关于延边未来的讨论会上^②，在政治结构讨论中，朱德海提出的“民族区域自治”主张受到了与会中国干部的一致赞同。在这次会议上，他否定了一部分人提出的“多祖国论”，宣称“朝鲜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开拓‘三满（东满、北满、南满）’，与各族人民一起参加发地反封建斗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奉献了自我。朝鲜族的如此光辉历史，谁也无法否认。朝鲜族是中华民国堂堂正正的一员”^③，从而明确确认了朝鲜族作为中国国民的地位。他意识到了朝鲜族民族认识和祖国认识问题的重要性，到延边后，立即召集各阶层代表召开座谈会，力图让大家认识到“多祖国论”的谬误与危害，他强调“正确认识历史和现实是关系到120万东北朝鲜族前进、发展方向及如何生存的重大问题，处理好这个问题，有利于朝鲜族自身，也有利于祖国大家庭的统一团结。”^④这与前文李根全所讲的重视历史题材的原因一脉相通。因此，《苦难的年代》中从延边归来，成为地委书记的朴胤敏应该是以从延边回来的朱德海为原型创作的。

结论

目前对《苦难的年代》的批评和研究主要聚焦在“忘却”，关注他为何“忘却”民族主义者的抗日武装斗争，为何“忘却”东北朝鲜人的真实生活。然而，本文主要关注了作品的“记忆”，探讨作品为何详细地“记忆”着其他人都选择“忘却”的东北朝鲜人共产主义者的抗日斗争，考察了作品所“记忆”的内容及其“记忆”的历史背景与目的、方式。

小说对1920年代后半期到1930年代末朝鲜人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武装斗争，以及期间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记述、还原与文学再现。小说用大量篇幅描述了1920年代后半期的减租减息斗争、1930年5月30日晚的“5.30暴动”、日军的“间岛征讨”与海兰江惨案、日军为了切断抗日联军与群众关系在东北推行的“集体村落”政策、1939年冬后日军和伪满国军的封锁镇压下东北抗日联军向中-苏边境线的撤退等历史事件。这些均是当时东北朝鲜人共产主义者和贫苦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抗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政府的英勇斗争，显示了朝鲜族在东北抗日斗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李根全以此宣言，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朝鲜人浴血奋战，功勋彪炳，他们是以巨大的自我牺牲获得了现在的幸福生活和国民资格。此外，小说还通过朴胤敏二人的延安归来情节直接将延边朝鲜人，即朝鲜族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史联系起来，从而确立了朝鲜族的历史正统性。

^① 《朱德海的一生》执笔组. 朱德海的一生[M]. 延吉: 延边人民出版社, 1988: 169页。

^② 名为“民族事业座谈会”，受中共中央东北军与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委托，12月21日在吉林市召开。金东火.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朝鲜族民族政策的历史性考察[A]. 金东火、金升澈编. 当代中国朝鲜族研究[C]. 首尔: 集文堂, 1995: 34页。李振英, 前文, 第112页, 再引用。

^③ 《朱德海的一生》执笔组. 朱德海的一生[M]. 延吉: 延边人民出版社, 1988: 227页。

^④ 《朱德海的一生》执笔组. 朱德海的一生[M]. 延吉: 延边人民出版社, 1988: 229页。

《苦难的年代》之所以把东北朝鲜族的历史纳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产主义革命史，是源于朝鲜族在抗战胜利到文革期间所经历的国家认同危机与李根全的历史责任感。事实上，建国初期到 1960 年代，朝鲜族虽然获得了中国公民权，但仍然十分重视与朝鲜的血缘之情，在朝鲜族知识分子阶层之间一度流行“多祖国论”。而且，在全国性反右派斗争的影响下，延边地区也出现起了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再加上当时朝鲜缺乏劳动力，重新回到朝鲜的“逆移民”现象频繁发生，朝鲜族的祖国观与国家认同成为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因为在文革期间的切身经历，李根全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一员，更加切实地感受到了确立朝鲜族历史正统性，巩固朝鲜族地位的必要性。因此，该作品的历史书写与其说是对历史的歪曲，毋宁看作为确立朝鲜族历史正统性而进行的民族史修撰尝试。如果说安寿吉的《北间岛》是为了帮助返回朝鲜半岛的战争难民确立本体性而写，李根全的《苦难的年代》则是为了确立朝鲜族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正统性而作。可以说，两篇作品都是现实目的影响历史写作的结果。同理，李根全的《苦难的年代》较之崔红一的《泪洒图们江》更为教科书式、更为程式化，也是源于历史认识的差异。